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胡適論學近著

(下冊)

胡適著



清末民初文獻叢刊

# 胡適論學近著

(下冊)

胡適著



朝華出版社  
BLOSSOM PRESS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胡適論學近著集第一冊

(84303.1精)

精裝 每冊定價國幣肆元  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胡適

發行人 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\*\*\*\*\*  
\* 版 權 所 有 \*  
\* 翻 印 必 究 \*  
\*\*\*\*\*

(本書校對者王煊善)

六四七五上

# 目錄

上冊

原刊本（一九三五年刊本）扉頁

自序

目錄

第一集 卷一

第一集 卷二

下冊

第一集 卷三

第一集 卷四

第一集 卷五

一

三

五

一一

一五九

三三一

四四七

五七三

## 辨僞舉例

——蒲松齡的生年考——

盧見曾的國朝山左詩鈔卷四十五有蒲松齡小傳，引張元的蒲先生墓表說：

卒年七十六。

張元的墓表全文，我那時沒見着。魯迅先生的小說史略根據聊齋文集附錄的墓表，說蒲松齡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，越四年遂卒，年八十六。（一六三〇—一七一五）後來我見着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聊齋文集（以下省稱『石印本』）果然有張元的墓表的全文，說他

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（一七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）卒，享年八十有六。以本年葬村東之原。又十年，爲雍正改元之三年，（一七二五）其孤將爲碑以揭其行，而以文屬余。以余於先生爲同邑後進，且知先生之深也，乃不辭而爲之文以表於墓。

張元於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作漁洋感舊集後序，自署「八十一歲老人」，是他生在康熙十一年（一六七二）。蒲先生死時，張元已四十四歲，作墓表時他已五十四歲了。他記蒲松齡死的年月日，決無不可信之理。

但山左詩鈔引墓表作「卒年七十六」，道光濟南府志（卷五四）也作「卒年七十六」。然而聊齋文集所錄墓表卻作「享年八十有六」。究竟是那一本是對的呢？

山左詩鈔刻於乾隆戊寅（一七五八）去張元之死（一七五六）不過兩年。盧見曾刻漁洋感舊集，張元替他補各人的小傳；山左詩鈔屢引張元所作的碑傳，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盧見曾所據的蒲先生墓表，必是張元的原本，應該是可信的本子。因此，我相信「八十六」是「七十六」之誤。從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上推七十六年，是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庚辰。

去年十月我到北平，借得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聊齋全集，（以下省稱「清華本」）其中有文集四冊，詩集兩冊。詩集中有降辰哭母詩，中有云：

老母呼我坐，大小繞身旁……因言庚辰年，歲事似饑荒。爾年（爾字此本作「兒」，後見馬立助鈔本作「爾」，爾年卽是那一年。）於此日，誕汝在北房……

庚辰正是崇禎十三年，可以證明七十六歲之說不誤。

文集中有述劉氏行實一篇，是他的夫人的小傳。劉孺人死於康熙癸巳（一七一三）年七十一。她生於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比蒲松齡小三歲。她死時，蒲松齡年七十四歲。詩集中有七十四歲的詩，次年七十五歲，有過妻墓的詩。以後就只有幾首詩了，最末一首爲除夕，仍有悼老妻的話，大概是七十五歲除夕的詩。詩集裏沒有七十五歲

以後的詩。這也可證聊齋先生死時大概是七十六歲。

淄川馬立勛先生（北大學生）不信七十六歲之說，他說，聊齋詩集裏有「八十述懷」七律兩首，詩中明明說「甲子重經又廿年」，他決不止七十六歲。此兩詩不載於清華本，止見於石印本。

馬君自己在淄川鈔得一部聊齋全集（以下稱「馬本」）其中的詩集裏也沒有這兩首「八十述懷」詩。這一點使我很懷疑。

今年我又借了清華本，準備用此本來和馬本和石印本互相參校，先請羅爾綱先生把三種聊齋集的文，詩，詞的篇目列爲一個對照表。羅君把這表寫成之後，來對我說：「石印本的文和詞，除了極少數之外，都是清華本和馬本所收的。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詩，共二百六十二首，沒有一首是清華本和馬本裏面見過的。」這就使我更懷疑石印本的聊齋詩集了。

昨夜我取出了石印本的聊齋詩集，翻出了那兩首「八十述懷」來細細研究。第一首全是泛泛的話，可以不論。第二首如下：

甲子重經又廿年，健全腰腳勝從前。論交差喜多名士，著錄新成祇短篇。春到東甯催力作，夏長北牖傲高眠。恬熙幸際承平日，與世無求便是仙。

我看出破綻來了，第五句有一條小註：『淄東有薄田數十畝。』我笑道：『這首詩是妄人假作的。蒲留仙決不會用「淄東」來註解「東菑」』

於是我又細細翻讀全部詩集，看見集中有許多聊齋的朋友的姓名，如王漁洋、王西莊、袁宣四、李約庵、焦石虹、畢公權、畢怡菴、邱行素、張歷友……等等，每人都註有名號，籍貫，科舉年分，官階，著作等等。這些人確都是聊齋的朋友，註的又這樣詳悉清楚，我如何能說這部詩集是假造的呢？

我看下去，又發見了兩件極有力的證據，真把我嚇倒了！第一件是兩首「己未除夕」的詩，有「三萬六千場過半」，「五十知非」薄伯玉」兩句，都是五十歲的話。己未是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）依七十六歲的說法，聊齋那時只有四十歲。如果他那年已五十歲，他應該是崇禎三年（一六三〇）生的，死時八十六歲。豈不是八十六歲之說對了嗎？

還有一件證據，是一首用蘇東坡石鼓歌韻的長詩，詩題是

戊寅仲夏，時明府將赴沂州任，同人以詩贈者皆用坡公石鼓歌韻，予辭不獲，因亦勉成一首，並送畢韋仲之、劉乾庵、沈燕及往九江。

這個詩題已夠嚇人了。詩中又有一條小註，說

齡今年六十八矣。

戊寅是康熙三十七年（一六九八）依七十六歲說，他只滿了五十八歲。如果他那年滿六十八歲了，那麼，他的生年應該提早十年，死時正是八十六歲了。

我看了這兩條嚇煞人的證據，很懊悔不該瞎疑心這部石印本詩集。我想，我的七十六歲說只好拋棄了。我請我家中住的胡鑑初先生（他正在研究蒲松齡的全部著作）來看這兩條硬證，我說：「我認輸了。」他也情願承認八十六歲的說法了。

可是，清華本和馬本的「降辰哭母」詩中說的生年在庚辰的話，又怎麼講呢？難道「庚辰」是庚午（一六三〇）之誤嗎？這一個字的證據，怎麼能抵敵那石印本的許多證據呢？

我的心終不死，忽然想起了聊齋文集裏那篇劉儒人的行實——這是三種本子同有的行實說：

儒人劉氏，……父季調，……生四女子，儒人其次也。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……嫡生男三，庶生男一……

松齡其第三子，十一歲未聘。（此依石印本。清華本及馬本皆作「十餘歲。」）聞劉公次女待字，媒通之……遂文定焉。

順治乙未（一六五五）間，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，人情洶動。劉公……亦從衆送女詣婿家。時年十三。

……

我看了這一段，又忍不住大笑了。我指給鑑初看，又翻開年表，我說：「劉儒人生於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是毫無

可疑的。如果蒲松齡的生年要提早十歲，那麼，他十一歲正當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他的妻子還沒有出世哩！她怎麼會「待字」呢？

這一條新證據足夠打倒石印本的那兩條證據了。於是我對鑑初說：「石印本的詩集全是假造的，所以沒有一首詩和清華本或馬本相合。這位假造的人誤信了那慕表的一個誤字，深信聊齋活了八十六歲，所以假造那二首假詩，一首「八十述懷」，一首「己未除夕」，一首「戊寅仲夏」。這個人真了不得。他做了二百六十二首假詩來哄騙世人；許多詩是空泛的擬古之作，如擬陶靖節移居，如擬杜荀鶴宮怨，那是不相干的。但他又查出了聊齋的一些朋友，捏造了許多詩題，又加上了許多詳細的註語，這些註語都好像有來歷的，所以我們都被他瞞過了。」

鑑初還有點不相信。我說：「我要把這些姓字履歷的註語的娘家，一條一條都查出來給你看。」我翻出一個詩題：

喜畢公權獲解

註云：

畢名世持，淄川人，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元。

我說，「這一條註，我記得清清楚楚是聊齋志異「馬介甫」一篇的註語。」我到書架上尋出一部聊齋志異來，翻開馬介甫一篇，果然有這一條：

畢公權名世持淄川人，康熙戊午解元。

我又指一個詩題：

同畢怡庵綽然堂談狐，時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夜也。

我說，「這個詩題也好像是聊齋志異上見過的。」鑑初和我兩個人同翻聊齋，不到一會兒工夫，果然在狐步一篇尋着了，原文是：

余友畢怡庵……

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，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，細述其異……

我又指一個詩題：

袁官四得古瓶，詩以豔之，有序。

序文凡一百四十三字，敘北村甲乙二人淘井得二古瓶的始末，一瓶入張秀才家，一瓶歸官四。我說，「這篇序也像是鈔聊齋的。」果然在卷十三尋得古瓶一篇，序文全是刪節這一篇的。還有一條註，記袁官四的履歷，也被這位先生全探去作另一詩題的註語了。

不到一個半鐘頭，這石印本的詩題的註語差不多全在聊齋志異的註語裏尋出來了。如李約菴和張歷友的履歷見於志異附錄淄川志小傳的註文，焦石虹的見於卷六狐聯簞註，邱行素的見於卷十三秦生簞，張石年邑侯

生祠事見於卷十三王大篇，「淄川古八景」的八個詩題全見於卷十四的山市篇的註文。——前後共尋出了十條證據，我可以下判決書了。判決的主文是：

審得有不知名的文人，鈔襲了聊齋志異的文字和註文，並依據了張元所作蒲先生墓表的誤字，捏造了蒲松齡和他的朋友們倡和的詩若干首，並且混入許多浮泛的擬古詩歌，總共捏造了二百六十二首歪詩，冒充聊齋詩集，石印販賣，詐欺取財，證據確鑿。

這案判決時，已近半夜了，我們都去睡了。今天早起，我又檢查山左詩鈔，才知道這位「被告」不但熟讀聊齋志異，並且還採用了一些別的材料。石印本詩集有一篇「杖頭錢，同歷友作」，並附錄張歷友的原作杖頭錢，張詩收入山左詩鈔的第四十三卷。石印本又有「贈歷友」兩絕句：

選政親操日杜門，窮搜八代溯淵源。一編防截傳名著，高士同教兩漢尊。  
山左推君第一人，蒲輪空谷賤紅塵。相嬉猿鶴輕軒冕，花落山房春復春。

詩後附註云：

歷友學殖淹博，揮灑千言。同時諸前輩稱爲冠世之才，不虛也。試輒冠曹。時宮定山中丞爲學使，以明經薦山左第一人，就京兆試，不遇，歸而處崑崙山，不復出，杜門著書，有八代詩選，班范防，五代史防，截，兩漢高士贊，崑

崑山房集等書，卓然可傳。豈以名位之有無爲輕重耶？

這一條註文，句句有來歷，都見於山左詩鈔卷四十三張篤慶（歷友）的小傳下的附錄。自「宮定山中丞」以下到「杜門著書」是鈔唐豹巖的崑崙山人集序；「學殖淹博，揮灑千言」是用漁洋詩話；所著書目五種是全鈔，盧見曾的跋語；只是「班范訪截」一個書名截去了一個「截」字。我疑心「被告」曾見過山左詩鈔的第四十三卷的殘本。

可是他決沒有見着山左詩鈔的全部。何以見得呢？山左詩鈔卷四十五有蒲松齡的詩十一首。如果他見了此卷，他決不肯放過這十一首真詩。石印本詩集沒有這十一首詩，可見他不曾見山左詩鈔的全書。

我們現在可以推測「被告」爲什麼要捏造這部聊齋詩集。滿清末年，上海國學扶輪社印出了一部聊齋集，其中有文，有詞，而沒有詩。民國以來，此書久已絕版了。大概「被告」見了這部扶輪社本，嫌他太少，就捏造了一部詩集，又加入了兩冊來歷不明的聊齋筆記，材料增添了一倍，湊成了六冊的聊齋全集，就成了一部定價兩元的大書了。文集中的志異自序和詞集中的惜餘春慢也是從聊齋志異鈔入的。筆記目錄後有黃珽的附記，自稱是聊齋的兒子東石的門人，在塵笈中得着太夫子的筆錄，整理爲兩卷。筆記中的材料無可供考據的；聊齋生四子，長名箬，有文名，不知是否字東石。

昨夜查聊齋志異時，我又尋得一條證據，證明聊齋七十六歲之說。志異卷十六有「折獄」兩篇，皆記淄川知縣費緯社的事。費緯社任淄川是順治十五年（一六五八）到任的。聊齋自跋云：

我夫子有仁愛名……方宰淄時，松裁弱冠，過蒙器許，而駑鈍不才，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……

他生於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到順治十六年（一六五九）正是弱冠之年。這又可見八十六歲之說必不可信了。我的結論是：

蒲松齡生於崇禎十三年庚辰，（一六四〇）死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，（一七一五年二月二十

五日）享年七十六歲。

二十年九月五日。

## 醒世姻緣傳考證

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的醒世姻緣，已排好六七年了；他們把清樣本留在我家中，年年催我做序。我因為不會考出這書的作者「西周生」是誰，所以六七年不能動手做這篇序。我很高興，這幾年之中，材料漸漸增添，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膽解答「醒世姻緣的作者是誰」的一個難題了。

這個難題的解答，經過了幾許的波折，其中有大膽的假設，有耐心的搜求證據，終於得着我們認為滿意的證實。這一段故事，我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，所以我依這幾年逐漸解答這問題的次序，詳細寫出來，給將來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個有趣味的例子。正是：

鴛鴦繡取從君看，要把金針度與人。

### 一 我的假設

醒世姻緣刻本首卷有「西周生輯著，然藜子校定」兩行字；又有一篇弁語，末尾寫着：

環碧主人題

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

這都不能供給我們什麼考據的材料。辛丑也不能定爲那一個辛丑；我們又無從知道這篇弁語是著書人的自序，還是刻書人的手筆。

書中的事蹟託始於明朝英宗正統年間，直到憲宗成化以後，都在十五世紀。（約一四四〇——一五〇〇）但我們看這部書裏面的事實，就可以知道這部書決不是明朝中期的作品。有幾條證據：第一，書中屢次提到楊梅瘡。我們知道楊梅瘡是西洋人從美洲帶回歐洲，又從歐洲流傳到中國的。在中國進口的地方是廣東，所以楊梅瘡在這書裏又叫做廣東瘡。哥倫布發見美洲在弘治五年（一四九二）已在十五世紀的末年了；所以我們估計醒世姻緣應該是十七世紀的書，或是明末，或是清初，不會更早的了。第二，書中屢次提到水滸傳西遊記的典故，（如第八十七回的牛魔王夫人，地煞星顧大嫂孫二娘等；如第九十八回林冲武松盧俊義等）可見這書的著作在水滸傳西遊記的定本已很風行之後，這也應該在明末清初的時代了。

我爲此事，曾去請教董綬金（廉）孟心史（森）兩位先生。孟先生曾給我一封長信，他主張此書大概是清初的作品。我後來推想楊梅瘡推行到北方應該需時更久，所以我也傾向於這一說。

但西周生究竟是誰呢？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從那一點下手呢？我研究全書的內容，總覺得這部書的結構很像聊齋志異裏的江城一篇。醒世姻緣的結構是一個兩世的惡姻緣：

(一) 前生

晁源射死了一隻仙狐，又把狐皮剝了。他又寵愛他的妾珍哥，把他的妻計氏逼的上吊自殺。

(二) 今生

晁源託生爲狄希陳，死狐託生爲他的妻薛素姐，計氏託生爲他的妾童寄姐。狄希陳受他的妻妾的種種虐待，素姐的殘暴凶悍更是慘無人理。後來幸得高僧胡無翳指出前生的因果，狄希陳念了一萬遍金剛經，才得銷除冤業。

作者在「引起」裏指出這一條可怕的通則：

大怨大仇，勢不能報，今世皆配爲夫妻。

他又有詩道：

……名雖伉儷緣，實是冤家到。前生懷宿仇，撮合成顯報。同牀睡大蟲，共枕棲強盜。此皆天使命，順受兩毋躁。

全書末回裏，胡無翳對狄希陳說：

這是你前世裏種下的深仇，今世做了你的渾家，叫你無處可逃，才好報復得苗實。如要解冤釋恨，除非倚仗佛法，方可懺罪消災。